

1839年11月4日，独立的马礼逊学校始在澳门成立，由美国人布朗（1810~1880）主持并任教师，除增添新生外，原附读于郭士立夫人西塾的学生也陆续来校复课。据布朗的报告称：“11月1日，我们搬进教育会购置的屋中，4日上了课，有六名小学生。……我安排他们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露天场地上运动和娱乐。……孩子们和我家庭混合在一起，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鼓励他们对我们具有亲密无间的信任，做他们的最好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参加我们家庭的早晚礼拜。简言之，我们是在努力使他们感到是同在家里一样，给他们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教育”^①。

1842年11月，马礼逊学堂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学校，随校迁港的学生有11名，至1844年学生发展至32名。学校的课程除汉语外，还包括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课程，还曾一度开设过化学课。学生经过三、四年学习之后，一般都能掌握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对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知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数学打下了一个基础，学生的知识面远比当时中国的封建学塾广阔。

马礼逊学堂是向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它以丰富的西学课程，充实了在此求学的中国青年，开阔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形成了他们的近代社会观念的基础。有些从此出发，更进一步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高层次西学人才。

二、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容闳

容闳（1828~1912），珠海南屏人，出生贫寒，七岁时入读澳门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创办的西塾。道光二十七年（1847）随马礼逊学校校长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

容闳的一生，是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使中国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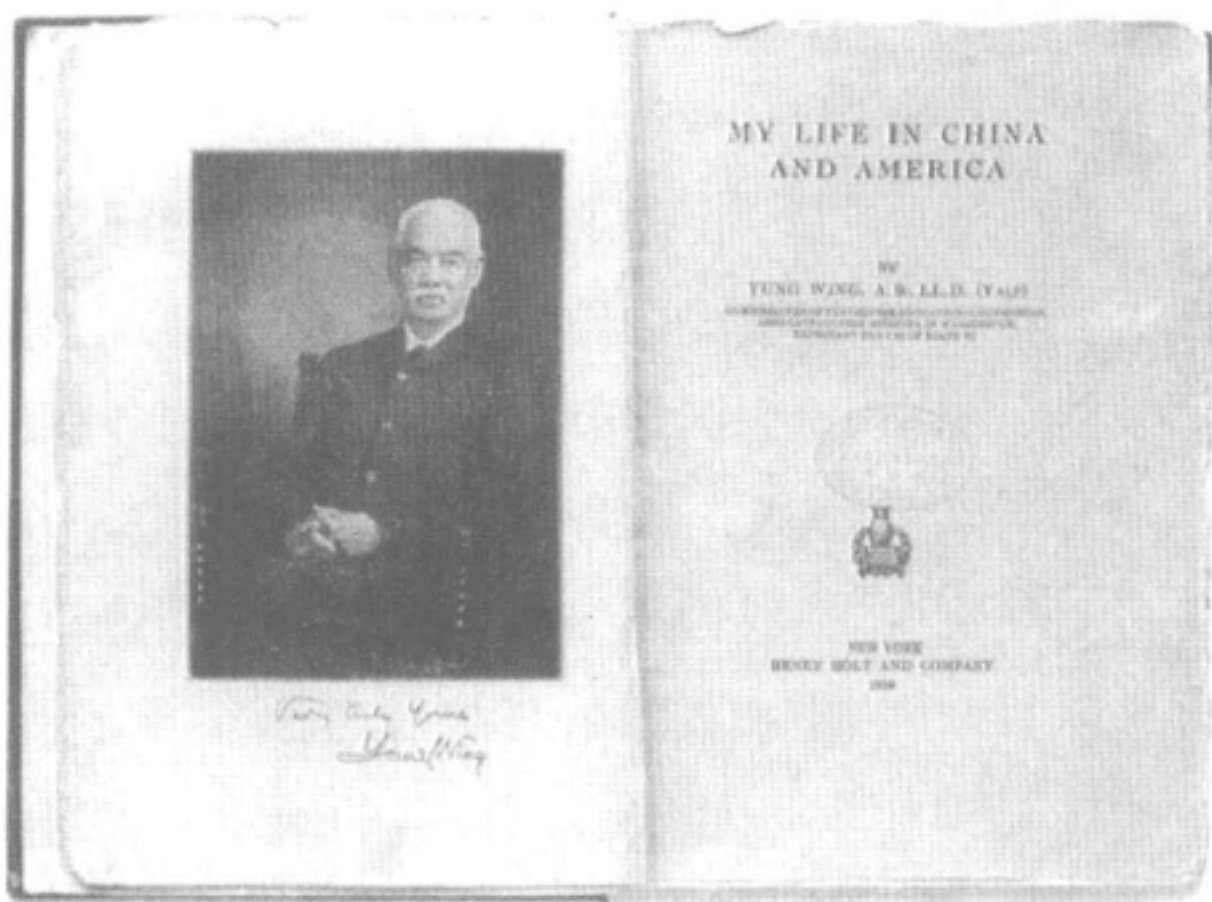
^① 《中国丛报》1841年10月，第569~570页。

代化而努力的一生，而他一生的努力，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西学东渐。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容闳目睹美国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回想起祖国在清朝统治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由此立下了“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大意愿，并且“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①。怀抱着宏愿回国后，容闳终其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

容闳回国后，在为自谋生路奔波期间，曾于1860年，同美国两位传教士潜入南京，访问太平天国辖区，并去干王府谒见洪仁玕，提出建立新式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军官；筹建银行；开办新式学校，引入西学，培养人才等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议。1863年9月，容闳结识了时任湘军总督的曾国藩，受命从美国购回各类机器，使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年得以顺利建成。1867年，经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兵工学校，培养军工技术人才。随后，又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翻译馆，翻译国内外书籍。

1870年，历经数年周折，在丁日昌、曾国藩等的支持下，容闳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终于获得朝廷批准。容闳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并任中国在美国设立的“留学事务所”副监督，为在美建立和经理留学事务所做出巨大贡献。派遣幼童留美计划自



容闳—西学东渐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872年9月第一批30人抵美，直到1875年止，共派出4批总计120人。尽管当时留学生未完成学业，但他们毕竟受过西文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技术，回国后在中国近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在这些学生中，有7人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有民国年间国务总理1人，外交部长1人，驻外公使2人，铁路局长、专家若干人，还有律师、商界、报界各式人，包括我国第一代矿冶学家吴仰曾，民国初年国务总理唐绍仪，以及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由于容闳操办的幼童赴美留学秉承了洋务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原则，与国内守旧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相径庭，清政府担心留学生全盘西化，将来无法控制和驾驭，1875年改派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副公使。1880年下令全部撤回留学生。此举一出，美国朝野哗然，国内具有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黄遵宪、郑观应等均表惋惜。容闳则痛心疾首，“自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六年，为余生最不幸时期，毕生志愿（指教育计划）概横遭摧残”^①。

晚年的容闳，以其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和敏锐的政治改革意识，从维新到革命，积极推动中国政治启蒙和政治改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容闳回国，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彼此十分投机，“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所”。戊戌变法夭折后，容闳因隐匿党人之嫌被通缉，逃出北京，混迹上海租界中。

1900年9月容闳东渡扶桑，在船上邂逅孙中山，两人既为同乡，且志同道合，互为景仰，相见恨晚。孙中山认为容闳当时是众望所归的领袖，容闳则推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其寄予厚望。1902年由于清廷的追缉，容闳登船赴美，从此永诀故土。1909年81岁高龄的容闳得知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势力日渐强大，决心给予物资上

^①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的支持。他与次子容颢槐（后为民国初年海军少将）会同美国军事专家布思拟订了一项“中国红龙计划”^①，此计划终因贷款失败而未果。1911年12月19日，病危的容闳获悉武昌起义成功，抱病写信致革命政府，热烈欢呼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功，表示一俟健康状况允许，将再次渡洋回国参加新生的共和国建设。

纵观容闳的一生，不难发现，容闳之努力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要使西方文明传播于中国，使中国变成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国家，容闳以他的精神和贡献，为“西学东渐”铺下了路基，成为中国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之一。

三、西学东渐惠及珠海

容闳是以澳门为起点接受教育，之后跨出国门，最终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从一定程度上说，容闳能够成就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容闳出生于离澳门一水之隔的南屏。自葡萄牙人据澳门以来，澳门成为了西方人往来穿梭于东西方的终点和起点站，300多年的西风西雨的吹拂沐浴，使得邻近地区的人对“西方老番”及“西语西学”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他们在当买办、引水，同西洋人经商交往的过程中，为实际利益所吸引，比较轻松地跨跃了中西文化的道德障碍，最早接触和接受了西方文化。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曾有这样的讲述：

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势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②

^①红龙计划主张：由孙中山任命布思为同盟会驻美全权财务代表，向纽约的财团筹取借款5000万美元，购置10万支枪、1亿颗子弹支援孙中山起义；为同盟会培训军官；筹组临时政府等。此计划终因贷款失败而未果。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正是因为如此，容闳在7岁的时候就由父母托人送入了传教士郭士立的妻子在澳门办的“西塾”。1839年“西塾”停办，容闳因父病逝停学回乡，与家人一起从事耕种，后又在澳门一间天文教会开办的印刷厂（澳门官印局）当印刷学徒。1841年，因郭夫人的友人霍白医生的资助，澳门的马礼逊学校又向他打开大门，容闳冲破母亲的阻碍，正式进入马礼逊学校，次年，随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在那里度过了六、七年的学校生活。

1846年9月，布朗因夫人患病请假回美，他在课堂宣布，凡愿跟他到美国去留学的请站起来，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一起去。容闳同黄宽、黄胜^①随着布朗夫妇一家，乘了美商同孚行的货船前往美国，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1850年，容闳考取了耶鲁大学，在布朗等美国友人的帮助和他自己在该校图书馆工作挣钱自助的情况下，经过勤奋学习，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1854年容闳学成归国。

在容闳毕其一生的西学东渐生涯中，幼童留美是其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项事业。“以教育界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这项事业得到了家乡人的大力支持，并且惠及珠海。

1871年，一所能容学生100名之学校——留美学生预备学校在上海成立。学生须经考试入学，各学生之学费、食宿和零用完全由政府供给。同年第一批学生开始在上海招考，考试及格随即前赴美国。

有着几千年祖先训导的中国要将孩子送到遥远的“蛮夷”去读书，这简直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尽管朝廷声明为留学生出所需全资，但举国“体面”之人仍对此事鄙夷不屑。苦心推行留美幼童计划的容闳无奈，只得回到家乡，把招生的重点放在广东。曾

^①这三名学生中，除了黄胜因病于次年退学回中国外，经过两年学习都毕了业。黄宽考取了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学生，并于1857年回国，在广州博济医院行医和培养中国第一代西医，为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国藩也特地委托北岭人大买办徐润劝说广东人送子应选。

其时属于香山县的珠海，毗邻澳门，比其他地方更早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而且由于300多年的对外通商，这里离开土地者众多，他们有的奔赴港澳，有的则到海外，和外界接触比较多，容易接受新事物，对国外了解相对较多，没有太多隔膜，也少仇视之心，所以在120名留美幼童中来自今天珠海的就有23人。^①

容闳留学美国，成为珠海的第一位留学生，为珠海带来了光荣。他所倡导的幼童留学运动，更为珠海培植了不少的人才，贡献于近代中国。当时留美幼童中珠海人回国后的情况如下：

1、第一批（1872年到美国）

蔡绍基（14岁），北岭人。初任上海大北电报公司翻译。后随同袁世凯办理朝鲜通商洋务。其后任天津外事局长、北洋大学校长、天津海关总监、天津海关道台等职，殁于民国22年。

容尚谦（10岁），南屏人。分发福州海军学校，毕业后在扬威旗舰见习。光绪十年参加中法福州之海战，旗舰受创，乃跳海游水登岸。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时，他担任环泰军舰舰长，后来任轮船公司经理多年。再转任平沈路运输处长，迄退休为止。

张康仁（13岁），南屏人。重赴美完成学业，在火奴鲁鲁与旧金山两地执律师业，曾任我国驻西雅图领事，殁于美国。



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总局门前合影



部分留美幼童于1881年被召回国前的合影

^① 珠海市博物馆、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编：《容闳与留美幼童》，第40～49页。

邓士聪（14岁），上栅人。福建船政局习机器。

谭耀勋（13岁），前山人。1883年毕业于耶鲁学院，同年歿于美国。

2、第二批（1873年到美国）

蔡廷干（13岁），上栅人。初大沽炮台鱼雷艇队服务。光绪二十年中日之战，任威海卫鱼艇指挥。后任北京海关税务司，歿于北京。

梁金荣（14岁），上栅人。在电报局服务，歿于江西省电报局长任内。

黄有章（13岁），上栅人。家居。

容尚勤（不详），南屏人。度其教书生活，歿于广州。

唐国安（14岁），鸡山人。服务唐山工矿公司，后任平沈路。协办清华学堂，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歿于北平。

张有恭（12岁），南屏人。早年溺葬于黄埔江。

邓桂廷（13岁），上栅人。分发福建海军，未毕业即离校，赴日本经商，歿于神户。

唐元湛（13岁），唐家人。上海电报局工作，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董事，歿于上海。

卓仁志（12岁），官塘人。曾在上海电报局工作，早亡。

3、第三批（1874年到美国）

唐绍仪（12岁），唐家人。初在海关工作。后来任袁世凯秘书、天津海关道台、驻西藏特派员、外务部次长。袁世凯时代内阁总理（后离袁氏参加国民政府）。广东中山模范县长，国民政府高级顾问。民国27年9月上海法租界寓所遇刺而亡。

梁如浩（12岁），唐家人。初在海关工作，后任平沈路局长，营口、上海等地海关道台。

容耀垣（10岁），南屏人。分发天津海军学校，毕业后转往汉口、香港经商，曾任孙大总统顾问，歿于上海。

徐振鹏(11岁),北岭人。分发福州海军学校,其后派北洋舰队。曾参加鸭绿江海战。任长江舰队司令。海军部次长、环泰舰长。殁于上海。

唐致尧(13岁),唐家人。初经商,后入平沈路与天津税务局工作,殁于上海。

4、第四批(1875年到美国)

吴其藻(12岁),翠微人。分发至福州海军学校,毕业后参加海军,至为活跃。曾参加光绪十年中法海战及光绪二十年中日海战。任驻高丽领事多年,后在京沪路工作。殁于上海。

谭耀芳(10岁),前山人。早亡于广州。

唐荣浩(13岁),唐家人,任山东省外事局长,山东省候补道台,殁于济南。

唐荣俊(14岁),唐家人。经营父遗商业,殁于上海。^①

上述留美幼童,回国后或服务于国家社会,或经营工商业,虽然从事不同工作,但都各有成就,不但有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珠海人的扩散,促进了珠海的文明。

容闳和留美幼童的留学和归国,使珠海留学生的群体不断扩大。珠海留学生群体的家族性和地域性特征产生了“滚雪球效应”,使珠海乃至全国的留学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点到面,并带动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以容氏家族为例,从容闳开始到其儿孙、堂弟、堂侄及其儿孙,大多都是留学生,唐绍仪家族也是如此。珠海的南屏、唐家、北岭都是留学生集中的地区,主要是因为容闳、唐廷枢、徐润的中介、荐保作用。所以珠海近代留学生群体以留美学生为主。与后来留日的速成、留法的勤工俭学和留苏的政治培训相比,他们大多接受的是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选择的专业比较务实。正是这样一种“滚雪球效应”,使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从南屏、唐家等村镇逐渐扩大到香山县、广东省,最后成为全国性的留学潮。

^①据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记载整理。

而留学的国家从美国开始逐渐发展为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学习的专业从实用学科向教育、军政等专业全面扩展。

除了容闳和留美幼童外，在中国近代史上珠海留学生群体还涌现出许多在各界颇有建树的人物。他们中许多都是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后代，还有陈芳家族、会同村莫氏家族后代等。这些留学生在政界、军事、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地位。